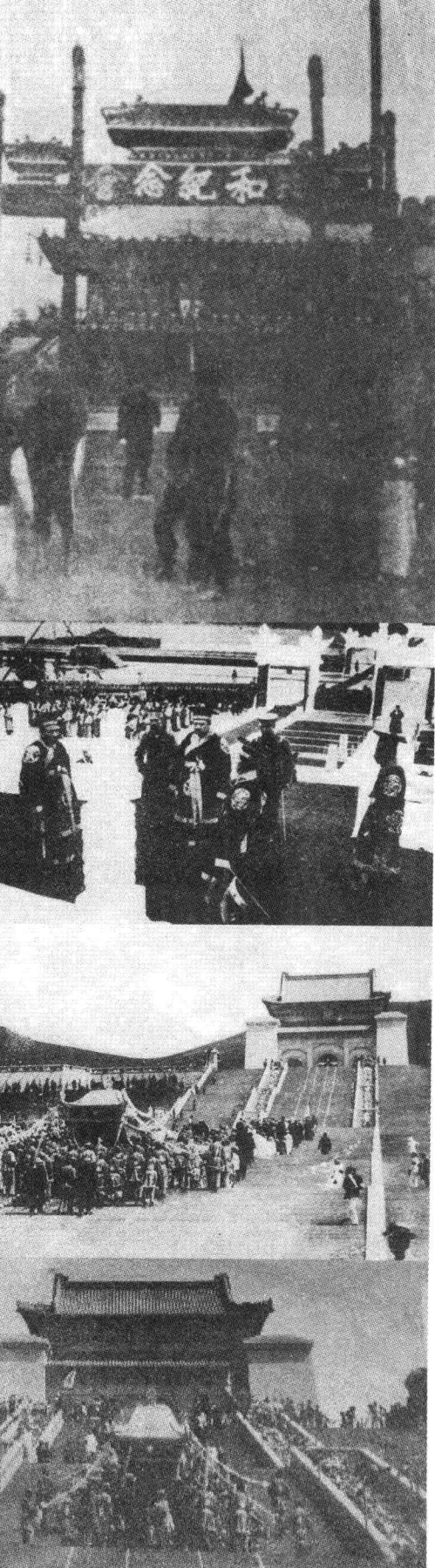


郭
辉／著

民国前期 国家仪式研究 (1912~193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CESS ACADEMIC PRESS (CHINA)



郭
辉／著

民国前期 国家仪式研究 (1912~193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前期国家仪式研究：1912～1931/郭辉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9
ISBN 978-7-5097-4957-9

I. ①民… II. ①郭… III. ①国家-仪式-研究-
中国-民国 IV. ①D693 ②K892.9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93798号

民国前期国家仪式研究(1912～1931)

著 者 / 郭 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李建军

责任校对 / 李 娟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版 次 / 2013年9月第1版

印 次 /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4957-9

定 价 / 79.00元

印 张 / 19

字 数 / 293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出版基金资助

序 一

罗福惠

十几年前开始有人请我为某些著作写序，我极少应承。这当中忙碌还是其次，主要还是因为感到在国人的意识中，序跋之类最好出自名家，如此方能为作品增色；或者出自同行，能够提要钩元，准确地指出其中的得失成败，当然在求序者是希望多谈优长，作序者也心领神会。我既不是名家，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个领域称得上内行，又生性耿直但主宽容，雅不欲违心溢美，亦不愿对找上门来的人还直指瑕疵，故只能不写或少写。

这几年写序多了一点，也绝不是因为觉得自己有了长进，事实上也是除了年龄在真正增长之外，最多也就是阅读数量还在增加，但研究和表达的激情却是负增长。作序的情况稍多，是因为内中存在某种关联甚至责任。这事一般限于两种情形：一是给我的同龄或同辈的作品写，这些人都接近或者过了“耳顺”之年，功力既富，涵养到家，所以我无论臧之否之，都能宠辱不惊。而且我们多有共同的人生经历和相近的治学感受，读其作品实为回望前尘，写序也不过是当一回历史的见证，至于作品写得好不好，可以说与我无关。二是应我指导过的博士们的要求，为他们以学位论文为基础而写成的学术著作写序，这次为郭辉的《民国前期国家仪式研究（1912~1931）》作序，就属于此类，所以这里面多少有一点责任。

郭辉于2009年秋从我读书，初遇即感到他为人真诚。继而发觉他很勤奋，还很聪敏，但是之前练笔不多，在思虑中不善发挥和提炼，文字表达还略显幼稚，所以给他修改小论文时，有时都不耐烦了。郭辉后来说我曾给过他“下马威”，弄得他差一点都没信心了。我听后告诉他，我对学生

一视同仁，历来比较严格，如果说真有点厚薄之分，倒是对真心向学的人会多一点批评。而且我还清楚地记得，1980年我刚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次业师章开沅先生到我的宿舍来听取学习汇报，汇报时我只谈读了几本书的心得，没有涉及有关方面的史料。章先生再看我的书架，果然没有史料书，书桌上也只摆着薛君度先生的《黄兴与中国革命》等几本著作，当即很严肃地指出，只读他人的研究成果而不注意阅读和收集史料，就像一个观众只想欣赏铜制工艺品而没打算入山采铜，难道你只打算做一个史学著作的读者？这个“下马威”的作用影响我几十年。

好在郭辉很快就上了路。2009年底我们争取到了教育部的重大委托项目，即为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决定撰写200余万字的《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时间只有一年多，研究所内的大多数教师 and 基础较好的研究生都参与了或收集资料或撰写初稿的工作，其中包括郭辉。郭辉善于学习。我们在上课讨论或随意闲聊时，会涉及一些“记忆史”“新文化史”的理论问题，或者具体谈到辛亥革命后各种人物的个体记忆，有关集体记忆的差异与变化，有关纪念活动的时代背景及其深处的意涵等，多数是老师由既往读书积累中形成的一些模糊印象，或者经碰撞产生的一些朦胧想法。但郭辉却能够放在心上，迅速跟进，往往半个月一个月之后，就能拿出一篇短文的初稿和我讨论，要求修改。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逐段讨论，逐字逐句斟酌，一篇短文要反复大修改两三次，才向刊物投稿。以后就渐渐快了，我也省心省力，看过一遍，稍加指点和修改，他就能独立发表了。3年下来，他居然一共发表了10余篇论文，这在我指导过的30多名博士生中，确实是很突出的。当然不可否认，这些文章未必都很成熟，而且参与重大项目研究和辛亥百年纪念热，给他提供了客观的机遇，但他在主观上的勤奋努力，毕竟是根本条件，也起了决定作用。

不过其间郭辉初步设想把“民国国家仪式”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时，我仍有些吃不准。因为多年来我自己涉及的大范围虽是文化史，但还是偏重于精英思想和学术文化，于社会、民间文化也只是出于好奇才偶尔涉猎，对官方的礼乐、祭典等，一直以宣传形式视之。我总记得孔夫子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以仁爱为礼乐的精神

内涵，认为少了仁爱之心的礼乐，只能流于形式，甚至成了骗人的作秀和表演。保守人士认为近代是传统的“礼崩乐坏”，激进的人士把官方的类似活动视为闹剧，如鲁迅就写有（或只是记录）“南京民谣”，讽刺1930年代初“党国要人”煞有介事的谒中山陵仪式，“大家去谒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即表面是冠冕堂皇的如何同心协力，继承总理遗志，真心想的是如何钩心斗角，找机会给对手致命一击。当然鲁迅的“各自想拳经”只是一种对“坏人”尽力往坏处想的揣测，但民国国家仪式是否值得深入探讨，能够体现何种思想意义，我确实没有把握。

郭辉带着我提出的问题，认真阅读了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保罗·康纳顿、让—马克·夸克等人的西方新文化史理论著作，从民国时期的大量报刊上搜集资料，当然也借鉴了近几年境内外众多学者的类似研究成果，逐渐形成了国家仪式转型的内外条件、仪式背后的政治诉求、舆论态度和社会反映的初步研究框架。随着对民国各个历史阶段情形了解的深入，再逐步细化，发掘南京临时政府和袁世凯统治时期国家仪式政治内涵的区别；国民党以广东为根据地时期与统一全国后仪式政治内涵的变化；再以“仪式的困境”和“仪式的调适”参杂其间，提炼出国家仪式的操演，根本目的是建构制度和政权合法性。有关仪式的内涵，论文概括为形塑国家和领袖形象，传播本系本派英勇奋斗的历史记忆，维护政治秩序或作社会动员，从而形成其制度化的政治文化，建构一种“新传统”。至于仪式的效果，用古话说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取决于人们各自的立场。而且正如作者在论文中所说，“国家仪式并非一个孤立的单独物，尤其对于合法性的建构而言，必须与当时的政治理念、社会环境、群众心理等结合到一起，才能发挥出应有的效果。……一旦合法性基础本身出现问题，则与之相应的国家仪式也会遭受危机”。总之，郭辉在学位论文中对数种典型性国家仪式的深入分析，对系列仪式所折射出的政治形势变化，对仪式背后的政治目标及其社会反应，都立足于史料，作了较为深刻详尽的探讨，尤其是做到了既能深入其中，又能出于其外，得出科学、中肯的结论。

由于该书本是一篇博士学位论文，所以我还想趁机就博士培养的质量

问题谈谈最近的一点想法。近几年对博士生的质量问题,不仅在教育界,甚至在社会上,也是一个关注热点而且非议颇多。的确,我国博士生的录取,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每年数十人,增加到近年的数万人,无论是攻读者还是指导者,准入门槛是大大降低了。从我自己历年参加校内外的论文评审和答辩的情形来看,博士生的研究与前人重复甚至雷同,缺乏新意的情况并不鲜见。教育部在三年前组成专家组进行调查研究,最近出台了《中国博士质量报告》和《博士质量:概念、评价与趋势》两项成果,其中有一项“客观”结论是“博士生自身和导师对我国当前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总体评价是较好的,总得分超过了70分”。但这个评价似乎并不被学界认可。因为谁都知道,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国人个体的自我感觉突然出奇地好,对各种荣誉、职衔、实利等,无不见猎心喜,争之恐后,获得者居之不疑,要让博士生和导师自己评估自身,有点近于开玩笑,何况“量化”的最后结果70分,使人觉得还是那种老套的“三七开”!

不过我也难以苟同某些人的惊人之论。例如有一位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任某名校领导,此后也一直为高教改革呼吁的前辈提出,“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把培养博士生的工作集中到名牌大学去。然而现在的问题在于名牌大学是否所有学科和专业都比非名牌大学办得好?恐怕未必。非名牌大学也有学风良好、学术领先的学科和专业,也出现过优秀的毕业生。在不能使报考人数自然减少的情况下,如果任由少数名校名师垄断博士生教育,就会抑制竞争,使名校中名师一人带十几人甚至几十人的个别现象更加普遍,质量是提高还是降低,只能是未知数。

又如有从海外归来的洋博士认为,“以美国三流大学的学术标准来衡量,中国大陆99%的研究员教授和毕业的博士是不合格的”。于是有海归洋博士同声相应,认为中国大学根本不适合培养博士,应该“关掉绝大多数的博士课程,借助国外大学培养博士,集中国内的资源把本科生教育搞好”。不知道他们把美国大学分成了几“流”,“三流”是不是最末一“流”?如果是的话,那这个问题可太严重了。还有这个99%的比例是通过调查统计还是姑妄言之?个人的力量、资源和讯息总是有限的,居然作出如此总体(甚至是全体)的判断,“大气”可嘉。别的学科我不了解,

就是对本学科我也胸无全局而仅知大概，但相信以中国人研究中国史，不可能一概比美国的三流大学都差，何况美国的三流大学是否设有中国史或东亚史以及“汉学”专业，还是个问题。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先生为中国学生一窝蜂涌向日本学东洋史而写过诗，诗中有“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80年过去了，如果按上述几位洋博士的意思，今天中国学生如要攻读博士学位，不仅要“群趋西洋受国史”，还要受国文，受国语，受中国医学，受中国艺术……受所有的学科和专业教育才能“合格”。

当然我这样说绝非基于什么尊严而反对向他人学习、反对中国学生去国外攻读博士学位，更不是否认我们博士培养中的种种不足和问题，而只是认为中国的博士生教育不能仅唯少数名校是赖，更不能让中国大学的博士教育工作统统“休克”，靠外国大学给我们培养各类博士。

博士的水平和质量如何，不能仅靠问卷式的调查研究，更不能仅据培养单位的自我总结，要靠更大范围各种形式的实际的检验。虽然我们几乎所有的学位论文，基本上经过了导师和指导组的审阅，几位外单位同行的盲评，还有答辩委员会的把关，最终还要进入数据库，但这个范围还不够大。人文、社会学科的学位论文，应该是检验的最终对象。其中稍好的会被研究者自己化整为零，陆续在期刊杂志发表；或者会作为前期成果，成为基金资助的项目课题；更有意义而且成熟的论文，就直接形成公开出版的专著，才会受到更多同行和读者的再次审视。在博士们自己方面，顺理成章地带有借此升职升级的意图；在曾经的指导者方面，则更多的是视为对自己和学生的再次的严格检验。所以真心希望得到各种批评和指教。

是为序。

2013年早春于华中师大

序 二

郑大华

多年来，我在不同场所皆主张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不仅要利用唯物史观为指导，用历史的、发展的、联系的观点进行研究，还主张运用现代心理学、比较研究法、西方社会史等理论和方法，贯通学科局限，融合中西，力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探讨上有所创获。郭辉跟随我学习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后，即贯彻该主张，有意识地在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上尝试用多学科综合的方法。不过，硕士阶段的学习只能算研究入门，未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如今，捧着郭辉的书稿，发现他一直没有忘记我当初的主张，在博士三年的学习中不断摸索，并得以成功实践。该书的选题、写作、研究方法显然受新文化史潮流的影响，从一个新的角度，运用新的方法对民国思想文化史进行考察，丰富了民国思想文化的面貌。

学术界的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已出现不少颇具影响力的成果，该领域的研究渐显成熟。由此，也逐渐兴起了对传播思想文化媒介的探索和考察，诸如报刊、书籍、社团、图像、器物、纪念日等，这些研究不仅关注具体的思想内容，也关注思想形成的过程、语境等，使人们能够更清晰地了解思想传播的途径和样式，丰富人们对思想文化史的认识。

郭辉这本书正是在此趋势下对国家仪式的考察，选题颇具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民国史研究的发展有较大作用。民国前期国家仪式对同时期政治文化的塑造、强化、传播有着巨大影响，在中

国礼仪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国家仪式的研究是近年来国内外史学界一个逐渐兴起的前沿性研究课题，学界对近现代中国国家仪式已有一些个别研究成果，但作为整体的考察，该书显然试图在这方面有所探索，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选题。

该书内容新颖，主旨明确，并不像诸多新文化史研究显得“花俏”。学界虽未能宏观关照民国前20年的国家仪式，但要想写出新意并非易事。通过短时间全面研究民国前20年所有国家仪式显然不太可能，倘若选择不当，又容易与学界已有成果重复。该书在此问题上下足功夫，既避免光靠理论分析而获取创新的浮泛，又避免靠个案研究而罗列成篇的不实。该书显然是吸取了新文化史理论的“神”，将之贯彻于实证研究之中，既有理论，又有叙事，是难得的佳作。

该书结合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知识，以界定“民国国家仪式”概念，角度新，方法新。于此，该书以政权合法性建设为论旨，用个案形式考察民国前20年间国家仪式的操演状况。全书通过搜集大量史料，综合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以时间为线索阐述民国时期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国家仪式，描绘民国前期国家仪式的变迁史。而从纵的方面抓住典型个案，涉及国家仪式操演的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恢复各种国家仪式操演的场景，仪式举行的社会反响，进而探讨国家仪式本身及背后所蕴藏的政治文化内涵和意义，系统深入探寻国家仪式与合法性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国家仪式举办的主观动因和客观功用，认为国家仪式成为“政治表达”的可资利用的重要工具和形式。

2006年，郭辉从河南大学本科毕业后，考入湖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记得，刚入学的时候，还未分配导师，有一天他找到我，说想跟随我学习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就这样他成了我的学生。恍眼间，已六年有余，他已经从华中师范大学读完博士，回到湖南师大工作，在岗位上继续发扬他的艰苦勤奋，不断地努力，工作未一年，即发表多篇高质量的文章。这得益于他华中师大的三年博士学习，在专业知识水平上得到非常大的提高，科研能力明显增强，完成了近40万字的博士学位论文。此书正是

在他博士论文一部分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即将出版，感到十分高兴。该书是郭辉的第一本书，只是其学术探索漫漫长途中的第一步，希望他不负众望，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前进，创造更多的成果以回报大家的期望，贡献于学界。

是为序！

2013 年 6 月于岳麓山下

目 录

Contents

导 论 / 1

- 一 写作缘起及意义 / 1
- 二 学术研究现状 / 6
- 三 理论方法与概念界定 / 11

第一章 民国国家仪式产生的背景 / 17

- 一 中国传统礼仪、节日文化的影响 / 17
- 二 域外“现代”国家仪式知识的传入 / 20
- 三 中西交织下的“清末”国家仪式 / 24

第二章 民国国家仪式的产生 / 28

- 一 阐释“国家”：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仪式 / 29
- 二 宣告“正统”：中华民国南北统一大庆典 / 40
- 三 权力转移：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典礼 / 50
- 四 “革命”传统：民元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 / 62
- 五 “共和”精神：民元双十节纪念 / 67

第三章 民国国家仪式的扩展 / 75

- 一 借助天神：祭天大典 / 76



2 民国前期国家仪式研究 (1912 ~ 1931)

- 二 尊崇孔子：国家祀孔 / 91
- 三 实权的表征：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典礼 / 106
- 四 总统的接替：徐世昌总统就职仪式 / 120

第四章 民国国家仪式的党国化（一） / 135

- 一 国民党与北京政府的博弈：孙中山北京葬礼 / 136
- 二 党国政治的权力化表达：孙中山奉安大典 / 157

第五章 民国国家仪式的党国化（二） / 201

- 一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革命纪念日”体系 / 202
- 二 “革命烈士”的建构：革命先烈纪念日 / 209
- 三 “革命领袖”的塑造：孙中山诞辰与逝世纪念日 / 218
- 四 “革命事迹”的强化：国庆纪念日 / 236

结语 国家仪式与政治合法性的建构 / 266

参考文献 / 276

后 记 / 289

导 论

“民国国家仪式”指中华民国时期由南京临时政府、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中华民国南京政府三个国家层面的政权正式主导或派员参加，普通民众主动或被动参与，出于某种原因，周期性或指向性进行的程式化行为活动。国家层面正式主导或派员参加，将国家仪式与地方或民间仪式作出区分。本文的研究范围和考察对象为民国前期（1912～1931年）的国家仪式，尽可能关照国家仪式操演的时代背景与政治环境，恢复各种国家仪式操演的场景，进而探讨国家仪式本身及背后所蕴藏的政治文化内涵和意义，揭示国家仪式与合法性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 写作缘起及意义

近年来，国家仪式活动在中国越来越受到重视，包括“全国哀悼日”等在当今中国出现。2008年5月19日，汶川大地震发生7天后，国务院决定5月19～21日为全国哀悼日，全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而国家最高领导人与全国同胞一起自5月19日14时28分起，为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默哀3分钟。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明确设立“全国哀悼日”。后在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后，再次设立“全国哀悼日”，以示哀悼遇难同胞。

当然有不少庆典形式的仪式活动。2008年8月8日，北京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在中国国家体育场隆重举行，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并

宣布本届奥运会开幕。开幕式中两千多年历史的奥林匹克运动与五千多年传承的中华文化得到展示。还有在 2009 年 10 月 1 日国庆 60 周年阅兵式上,数十个徒步方队、装备方队及空中梯队经过天安门,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据称,此为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中国军队装备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全景“操演”,许多新式武器首次亮相,展示出国威。

也有备受争议的“国家级”公祭。针对陕西将 2004 年的黄帝陵公祭礼仪“升格为国家级”,有学者质疑“这种做法不妥,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利于民族团结,更违反宪法”,提出“祭祀黄帝只能由民间社团或个人进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不应参与”。^①其实,当今中国早已有国家领导人参与公祭。1994 年,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参加陕西公祭黄帝典礼。至 2010 年,每次皆有国家级领导人参加。当然,政府一直强调国家领导人的参与纯属个人行为,国家亦从未正式下文派员参与公祭事,但似默认其进行。

据观察可知,诸如此类国家仪式操演的目的主要为国家社会服务。比如,汶川地震后的三天“全国哀悼日”的意义就在于:第一,是关注民生、尊重民意的民主政治的体现;第二,设立“全国哀悼日”,是国家制度建设上的一个里程碑;第三,设立“全国哀悼日”,必将凝聚全民族的力量;第四,三天举国哀悼,是全民族精神上的一次升华;第五,设立“全国哀悼日”,展示中国更加开放的姿态。^②国庆阅兵式则是“展国威、扬军威的最佳方式,更是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重要形式”。^③“国家级”公祭中的国家意识可能并不明显,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为的是发展地方经济,而仪式本身展示的是中华民族共祖的象征——黄帝。此类国家仪式正体现出其本意:构建民族国家认同,形塑国家政治文化,改善国民政治观念。

但在特殊时期,国家仪式操演的目的就不一定在国家社会。“文化大

① 葛剑雄:《“国家级”公祭黄帝质疑》,《南风窗》2003 年第 15 期,第 60~61 页。

② 张丽峰:《再谈设全国哀悼日的意义》,《中国妇女报》2009 年 5 月 19 日,第 A2 版。

③ 张芹、李琨:《解读国庆阅兵仪式的结构及其象征意义》,《新闻爱好者》2010 年第 4 期(下半月),第 32 页。

革命”期间个人崇拜之风盛行，国家仪式是否依旧为“国家”的操演？1969年国庆20周年阅兵或者说群众游行为绝佳例证。据亲历者回忆：10月1日上午10点整，毛主席第一个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天安门广场顷刻锣鼓喧天，欢声雷动，整个广场变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毛主席频频向周围和广场上的庆祝大军挥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直冲云霄。^①《人民日报》报道，“国庆观礼代表在首都的日子”，代表们见到毛泽东时千遍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②“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仪式成为个人崇拜的工具。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之际，在诸如开国大典之类的国家仪式操演中，国家仪式确为“国家”的呈现。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代表齐集天安门，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北京各机关、团体、工人、学生、市民数十万人参加盛典。大会典礼程序为：一、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宣布开会；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就位，副主席就位，委员就位；三、奏《义勇军进行曲》；四、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升国旗（同时鸣礼炮，礼炮毕，奏《义勇军进行曲》）；五、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六、阅兵（1.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检阅，2.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下达阅兵命令，3. 进行分列式）；七、游行。^③当天《人民日报》社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为题，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基本特点是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及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④强调包括各民主阶级在内的新中国诞生，力图争取各方人士认同新生政权。

1949年9月30日下午6时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也意在丰富新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典礼秩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代表就位。

① 赵军：《特殊历史时期的国庆大阅兵——1969年国庆20周年亲历阅兵纪实》，《党史天地》2009年第10期，第24页。

② 《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胜利》，《人民日报》1969年10月8日，第2版。

③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今日在首都隆重举行》，《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日，第1版。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日，第2版。